

文化大革命期间  
出土文物



##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

## 出土文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考古研究单位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支持和协助，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文物保护政策，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五年多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次展出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湖南、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新疆、山东、山西、甘肃、北京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出土文物。以河南、陕西两省为例，河南省这一期间在六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此外还发现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粮仓——隋唐含嘉仓，并清理了西周汉唐墓葬四百余座，出土文物万余件，现仅展出洛阳、安阳的部分历史文物。陕西省在此期间继续勘测、发掘西安等地的大型汉唐墓葬，在西安南郊清理了一处重要的唐代窖藏，并对九十六个县的文物进行四次普查，征集了大批文物，五年来，发掘和收集的文物近万件，现仅展出西安、岐山等地部分历史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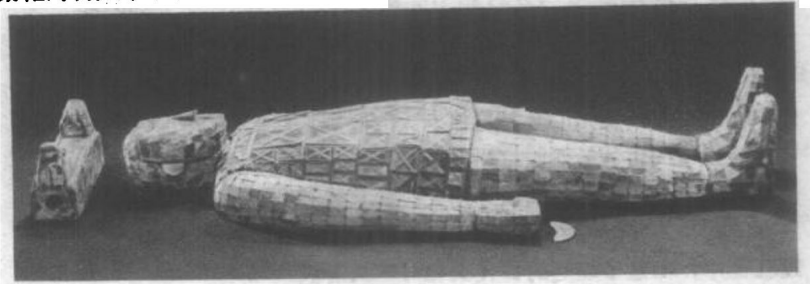
各地大量的考古工作和出土文物，对于研究我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中外友好往来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且亲切地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目前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正在通过考古发掘的实践和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把文物考古工作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各种文物，一方面深刻暴露和批判历代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罪行和反动腐朽的剥削制度，一方面热情歌颂创造历史和文明的劳动人民，为把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 河 北 省

### 滿城西汉刘胜夫妇墓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滿城陵山发现了第一号墓。七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了发掘。接着又发现了第二号墓。两墓都先在山岩間开凿具有墓道、中室、左右耳室和主室的規模巨大的洞室（第一号墓全长五二米、容积計二七〇〇立方米。第二号墓容积达三〇〇〇立方米），第一号墓于中室和耳室、第二号墓于中室中构建瓦頂木結構（已塌），两墓主室則更用加工的石板拼砌成石室。墓內放置大量随葬品，以第一号墓为例：右耳室貯大批陶器，用儲食物和飲料；左耳室随葬車六輛、馬十六匹；中室中部原設极为华丽的帷帳（帷帳已朽，存有大量鎏金銅杖具），帷帳內外列置大量銅器、陶器、漆器和陶、石俑；主室除棺槨（棺槨已朽，存有大量鎏金銅飾）外，还出有金銀器、玉石器。两墓所出的随葬品，总数达二千八百多件，其中有完整的能够复原的两套“金縷玉衣”。这两套金縷玉衣，一长一点八八米（男），一长一点七二米（女）（图一），都是用二千多片小玉片、角上穿孔，并以黃金制成的細絲联綴而成（两件玉衣所用的金絲共重約一八〇〇克），貼身穿在尸体上，企图保存尸体不朽。在发现时，尸体早已腐烂，两件玉衣的部分金絲和玉片已經断裂，現經整理加工，全部复原。此外，引人注目的是許多飾以金銀的銅器，例如錯金銀“鳥篆”（图案化的古文字）花紋壺、鎏金鑲嵌松石壺、錯金銀蟠龙紋壺、錯金博山



图一 金縷玉衣（女）



图二 错金博山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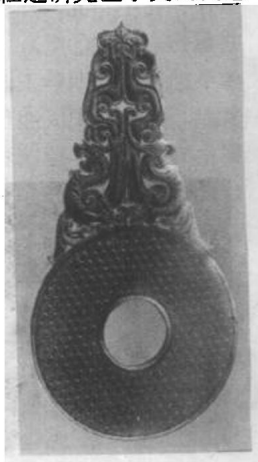
图三 朱雀灯

代中医五官科所使用的金针也没有大的区别。这批第一次发现的古代针刺医疗用针，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古笈所记二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掌握了针刺医术的历史事实。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爐(图二)，鑲金“长信宫灯”(封三)和一些鳥兽形的各种器物等(图三)。还有鑲雕精細的各种玉器(图四)。两套玉衣和这些精致的工艺作品，表现了当时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和高度的工艺美术水平。更值得指出的是墓中发现的几件穿孔工具和针刺医疗用针。二件青铜制造的穿孔工具：一件被推定是椎孔用具，长一点六厘米，径点六至点七厘米，尖磨三棱的椎状器；一件附有长一点六厘米铁柄的三棱钻头，钻头长一厘米，径点八五厘米，鑽尖略有磨損，这个鑽头約是裝置在鑽杆上，类似后来的“舞鑽”那样利用慣力进行鑽孔的(图五)。这两件穿孔工具的发现，給我国古代穿孔技术的研究，增加了重要的

实物資料。四根方棱柄带孔金针，针身长一点七至三点九厘米，径点一二至点一八厘米，其中一根尖磨三棱(图六)，經過研究医学史的同志鉴定，这四根金针和著录在金代医书上的“具鍼”、“鋒鍼”和“具利鍼”极为相似

①，甚至和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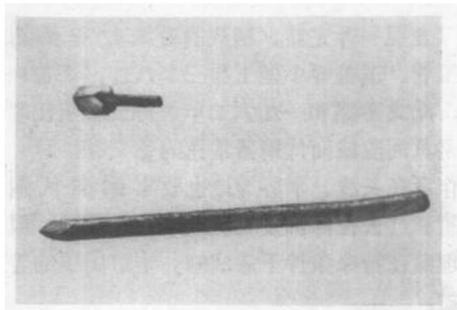


图四 带饰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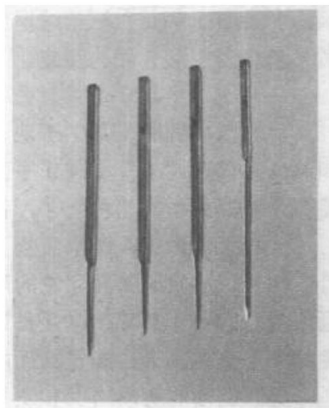
滿城汉墓的大量珍貴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的結晶，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

随葬銅器中有好几件鑲刻“中山内府”和中山王国的紀年等銘文，根据这些銘文和死者身上的“金縷玉衣”等，考定第一号墓是死于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的中山靖王刘胜墓。第二号墓是他的妻子竇綰墓。

刘胜是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sup>②</sup>，他的时代即是汉朝的“鼎盛”时期。工程浩大的墓室和大批精致的随葬器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經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文化成果都为封建統治阶级所掠夺。汉制諸侯王死，要强制屬民治丧。中山土地薄瘠<sup>③</sup>，所屬人口不过五六十万<sup>④</sup>，要“滿足”封建統治者生前死后这样的穷奢极欲，劳动人民怎能不被掠尽榨干！封建历史上所謂盛世，实质上就是对于創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的进一步榨取。“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經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統治。”結果必然引起革命，文献記載刘胜死前一年(元鼎三年即公元前一一四年)关东郡国人相食<sup>⑤</sup>，死后六年(元封四年即公元前一〇七年)关东流民数字高达二百万，再过六年(天汉二年即公元前九九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等地到处爆发了农民起义，燕赵之間的甄卢、范主的暴动，声势巨大，“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sup>⑥</sup>，震撼了黄河以北。刘胜夫妇两座墓的发掘給我們提供了当时燕赵間封建統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已达到极为残酷程度的最为形象的例証。



图五 穿孔工具



图六 金 针

- 注：① 见元杜思敬《济生拔萃方》卷三所收金人《鍼经摘英集》。
- ② 见《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
- ③ 见《史记·货殖列传》。
- ④ 《汉书·地理志》记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山国户十六万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万八千八十。”元始二年上距刘胜死时已一百一十一年，刘胜时期中山国人口当少于汉志所记之数。
- ⑤ 见《汉书·武帝纪》。
- ⑥ 见《史记·酷吏杨仆传》、《汉书·酷吏咸宣传》。

## 湖 南 省

### 湖南北部发现的商代铜器

湖南省北部沿洞庭湖一带，不断发现中原风格的商代晚期铜器。解放前桃源曾出土商代方彝，解放后石门也曾连续发现商代铜卣、铜盃。但出土最多的地点是宁乡黄材公社，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带前后出土的大型青铜器有十余件，大部分制作精细，有的铜容器中还贮有数以百计的小型铜兵器和玉器。一九六三年这里发现了商周之际的遗址①。湖南地区的商周考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九七〇年，宁乡黄材公社又发现一件完整、精致的对凤纹提梁卣（图七），卣内满贮玉环、玉玦、玉管、玉兽等小型玉器三二八件，卣盖内和器底都铸有“禾”（戈）字铭，此戈字铭和一九六二年黄材公社所出饗鬲文分襜鼎铭中的“禾”②，都是黄河流域商代铜器常见的铭文③。

文化大革命中，湖南文物工作者在长沙、华容等地也收集到商代铜器。在长沙收集的鸕卣，它的形制和过去在株洲发现的几乎全完相同；但遍体整碧，有玉质感，这是长期埋藏在特殊条件下造成的。华容出现的饗鬲纹尊，形体高大，圈足高而内敛。

商代铜器的连续出现和发现地点的不断增加，说明了湖南北部最迟在商代末期已经和中原地区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 长沙浏城桥楚墓

一九七一年二月，湖南省博物館配合建設工程在长沙市区瀏城桥发掘了一座长沙地区較为稀見的用白膏泥填塞的春秋晚期的木槨墓。由于白膏泥的防腐作用，棺和随葬品保存較好。槨两层，外槨用三四厘米見方的木柱建成。內槨用八厘米厚的木板拼起。槨室西側置四壁外凸作弧形的漆棺。随葬器物共二百七十餘件，絕大部分出自內外槨之間。仿銅器的陶器，精致的漆木器、車馬具和各种絲織品、竹器，反映了当时长沙地区的經驗发展和我国南方劳动人民的技艺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多种多样的兵器，有长短戈、矛（木柄戈长三点一四米，木柄矛二点九七米，藤柄矛二点八米），有长戟（“积竹”柄长三点一米），还有一种有棱无刃长三点一米的积竹棒，这可能是《考工記》上所記的“殳”。殳、戈、长戟、短矛、长矛是“車之五兵”④。都是古代車战的兵器。此墓既出有車馬具，因此我們认为墓中所出的兵器，有可能包括一組“車兵”。墓中还发现不少箭，箭鏃的形式有三棱、扁平、三翼三种，大概也像古代文獻所記为了射远、射近、射深而制造的不同形式⑤。此外，还出有大小不同的竹弓、漆繪竹矢箠、塗漆皮甲、皮盾和带有漆鞘的短劍等。



图七 提梁卣及卣內所貯玉器

春秋晚期，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政治压迫，连绵不断地进行了战争。“春秋无义战”，正是揭露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当时地处南方的楚国曾多次发动战争，争夺霸权，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和痛苦。瀏城桥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計九十三件，占全部

随葬器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就是当时统治阶级进行残酷战争的实证。



## 长沙铜官镇窑

长沙铜官镇窑址是一九五六年湖南省文管会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的。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湖南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都作了调查和研究⑥。该窑开始烧造大约在晚唐五代，是在湘阴窑（岳州窑）的影响下出现的，但它在装饰方面的艺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一九六六年，湖南省博物馆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搜集了大批铜官镇窑的新标本，其中青黄釉下施褐绿兰彩注子、兰彩枕、贴花窑具和一些单色釉的儿童瓷玩具，在器类、器形和文饰上，都更加丰富了过去的认识。

晚唐以来，各地瓷窑无论器形或是装饰，都向摹仿金银器方面发展，铜官镇窑走在前面。由于商品竞争而出现的制造者铭记，在瓷器手工业中，铜官镇窑首先出现。这种刻划铭记的铜官镇窑瓷器，曾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龙媒岛上的高丽时期（公元九一八至一三九二年）遗址中发现过。可见铜官镇窑烧造的瓷器流传很广。

- ① 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刊《考古》一九六三年十二期）
- ② 《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刊《考古》一九六三年十二期）
- ③ 见容庚《金文编》附录上。
- ④ 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二。
- ⑤ 参看《周礼正义》卷八一、八六。
- ⑥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刊《文物》一九六〇年三期）。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刊《文物》一九六〇年三期）。

## 陕 西 省

### 西安唐代窖藏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建设工程中，发现唐代窖藏一处。陕西省博物馆进行了清理发掘。两个高六五厘米、腹径六〇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三〇厘米、腹径二五厘米的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钱幣、银铤、银饼和药材（主要是矿物药材）等千余件。

其中金銀器皿即达二百余件，是唐代金銀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这批金銀器造型优美，有环柄八曲杯、环柄八棱杯、羽觴、高足杯、带流大盃、六曲盘、桃形盘、提梁壶、提梁罐、双耳鍋、盪頂盒、三足鐘、熏爐和熏球等。其中許多是用捶打、綫雕（图八）、翻鑄、掐絲（图九）、細联珠、鑲嵌、鑲孔等技法做出的各种精細的花紋，为了花紋突出，有的衬以綫雕，施“珍珠地”（图十），有的将花紋部分鑲金（图十一）。花紋包括唐代流行的各种动物紋、狩猎紋、忍冬草、蔓草、蓮瓣和宝相花等。两件环柄八棱杯，每一棱面作出浮雕效果的乐工和舞伎的生动形象（图十二）。一件摹仿皮囊形式的提梁壶，壶腹两面各捶雕出頸系飘带口銜酒杯作蹲踏状的駿馬一匹（图十三），根据张說《舞馬乐府》：“更有銜杯終宴曲，垂头驪尾醉如泥”和《舞馬詞》：“屈膝銜杯赴节，傾心獻寿无疆”<sup>①</sup>，可以推测这是唐玄宗李隆基舞馬的写照。一些还保留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的器皿，經過初步的科学测定，认为紋路細密、圓心度很强的螺紋和接触密閉的子母扣的錐面加工等工艺，显然都是采用了簡單車床才有可能取得的工效。这



图八 刻花金碗（捶打、綫雕）

些文物，充分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手工业艺术。在造型、花紋和工艺各方面，有的器物受到波斯薩珊王朝金銀器的影响，但唐代金銀匠师們巧妙地吸取了它的精华而把它民族化了。这批文物中，也有一些是輸入的外国制品，如圓圈紋的玻璃盃、鑲金飾的瑪瑙兽首杯（图十四）、一枚拜占廷希拉克略的金幣（公元六一〇至六四一年）、一枚波斯庫思老二世的銀幣（公元五九〇至六二七年）和五枚鑄于公元七〇八年的日本銀幣“和同开珎”等（图十五）。这些都标志着当时中外交通的繁盛。窖藏器物中有紀年銘記的，最迟的是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銀餅，但根据唐代花紋的編年，可



图九 梳脊金飾（掐絲）

可以看出这批金銀器中的紋飾，有的可以早到七世紀中叶，有的也可以遲到八世紀中晚期。

这一窖藏的发现，給我們提供了唐代中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的实例。窖藏所儲仅就已发现的金銀器一項統計，純金重达二百九十八两，銀器共三千七百零两。窖藏发现的地点，是当时兴化坊橫街之南，据文献記載，这个地区在唐代中期居住过不少統治階級上层人物<sup>②</sup>，仅一处出土的窖藏，就集中了这样大量的金銀，可以想見当时整个封建統治階級对劳动人民的掠夺达到何等残暴地步！窖藏中发现的大批药材，可以更深刻地暴露唐代中期上层官僚、貴族生活的极端腐化和他們頹廢的精神状态。药材以各种丹砂、石钟乳和紫萁、白萁为大宗，这些药材都是所謂久服“不老輕身”、“延年益寿”的名药<sup>③</sup>。丹砂、石钟乳还需要按“仙經”煉餌<sup>④</sup>，

所以金銀器中还有煉餌所需的石榴罐和各种药罐。窖藏的每件文物都是

对当时封建統治階級的控訴，他們无止境地大肆揮霍劳动人民創造的財富，霸占劳动人民創造的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前进。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



图十 蓋頂銀盒（珍珠地）



图十二 环柄八棱杯



图十一 金花帶蓋銀碗（花纹鑲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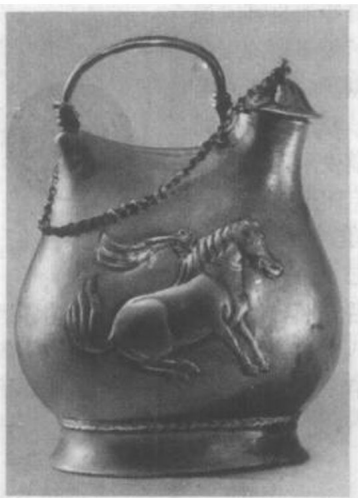
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 岐山、蓝田等地发现西周铜器

岐山很早就周人重要集居点之一，文王的祖父开始在今岐山京当一带建立都邑，所以，这里就经常传说出土商周铜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京当的贺家村发现了周代遗址和车马坑，并开始了试掘工作。

一九六六年底，京当公社社员在贺家村西平地取土，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

其中饗鬶纹簋铭二十三字：“乙亥，王宴毕公，迺易史蹟貝十朋，蹟占于彝，其于之朝夕监”。两件方鼎和一件饗鬶纹角都有“史速”自作器的铭文。一件饗鬶纹分襜鼎有“尹史”两字铭。此外还有提梁卣、夔凤纹鬲、调色器(?)和兵器、车马器等。几件铜器上的铭文，可以说明这批西周铜器的所有者是西周的史、尹之官。如果这批铜器是墓葬所出，这里就分布有西周史官的墓葬了。一个世纪以前的书籍中曾著录一件《乙亥彝》，铭文内容



图十三 仿皮囊舞马衔杯纹银壶



图十四 玛瑙兽首杯

与上述饗鬶纹簋铭完全相同⑤，这就可以断定岐山京当的周代遗迹，确实是早已被盗掘过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省除岐山外，长安、扶风、蓝田、宝

鸡等地也都发现了较重要的周代铜器。一九六九年春，蓝田泄湖镇发现的《永孟》（图十六）和以前美帝国主义盗走的那件《永孟》形制相似⑥，



图十五 东罗马金币(左)波斯银币(中)日本银币(右)

但新发现这件远比后者大得多（器高四六厘米，口径五八厘米）；更重要的是，孟内所铸一百二十三字铭文，记录了周共王十二年（公元前九三五年）命益公赐给叫永的田地的经过，其中列举了不少与赐田有关的官吏姓名，是一篇有价值的史料。



图十六 《永孟》

- ① 见《张说之文集》卷十。
- ② 参看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兴化坊条。
- ③ 见《新修本草》卷三。
- ④ 见《新修本草》卷三。
- ⑤ 见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卷五。
- ⑥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八一三著录。

## 湖 北 省

### 京山发现曾国铜器

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京山郑家河水库中干渠线上的一座高二十余米的土丘下，发现九十七件西周晚期铜器。有鼎、鬲、簋、方甗、盨、豆、方壶（图十七）、匜、盘和车马器等。其中鼎、豆和方壶有“曾侯仲子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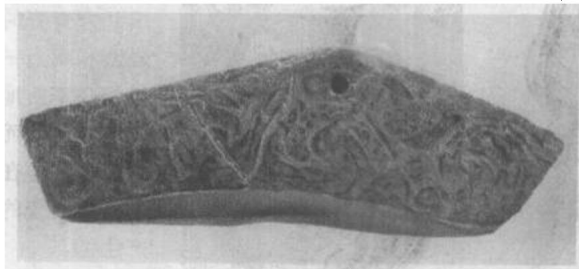
自作銘，隔有“黃□□”自作銘。过去安徽寿县所出《曾姬无卹壶》和传世的《曾侯簠》，记录了曾国和楚、黄等国的婚姻关系，所以有人推测这个曾国位于汝阳、南郡之間<sup>①</sup>，京山这次发现对曾国地理和历史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史料和重要情况。

### 江陵发现楚国彩绘编磬

二十五具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的彩绘石磬，是一九七〇年三月在江陵纪南城（楚郢都遗址）南的一座高约二米的土台中发现的。发现时，大型的在下，小型的在上，整齐地叠置成半圆形，显然是有计划埋藏的。石磬每具正背面和脊部都以红、黄、蓝、绿四色绘成繁缛的花纹，为了突出某一部分还加饰了金线。从较清晰的几具中，可以看出画面的主要题材是凤鸟（图十八）。相传我国古代音律的发明，由于凤鸟的启示<sup>②</sup>，石磬描绘它的形象，很有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二十五具石磬经过音响测验，知道并不是一套完整的编磬，但它的音质优美，音域宽广（至少已有三个八度左右之广——从 \*D<sub>4</sub>—B<sub>4</sub>），说明了当时制磬工师处理磬音高低的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图十七 《曾侯壺》



图十八 彩绘石磬

- ① 《寿县所出楚器考释》（收《古史考存》论文集）
- ② 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

## 河 南 省

### 温县发现商代铜器

一九六八年八月，温县城北城关公社社员在收获白薯时，发现一批商代晚期铜器，有方鼎、甗、三足罍和觚、爵等，还有乐器铜铙三件、铜戈、削、鏃多件，共二十三件。这里大约是一处奴隶主墓葬。其中三足罍高三七点三厘米，底内壁有“𠄎”（徙）字铭，腹外壁铸出直立展翅的鸚纹三组（图十九），纹饰奇特，极为罕见。

### 安阳北齐范粹墓

一九七一年三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安阳洪河屯清理了一座北齐墓葬。墓顶土洞，平面作方形。墓门内置武平六年（公元五七五年）范粹墓志。墓室西部砌砖棺床，东部置彩绘仪仗俑群和随葬器物。随葬器物中，

值得注意的是瓷器。北朝墓葬，关东地区多出瓷器，安阳一带发现更多<sup>①</sup>。这次发现的青瓷小罐、显绿彩青瓷瓶和三件印有舞乐场面的黄釉扁壶（图二十），是过去少见或未见过的新瓷艺。它反映了即使在

统治阶级混战的南北朝，我国北方青瓷的烧造和南方一样都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安阳地区还在孕育着白瓷的产生<sup>②</sup>。



图十九 鸚纹罍



图二十 黄釉扁壶

## 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

一九六九年底，洛阳博物馆在隋唐东都宫城东北发现并试掘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粮仓之一“含嘉仓”。仓城创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六〇五至六一六年）<sup>③</sup>，面积达四十二万平方米。四周的仓城部分保存尚完整，基部宽达十七米。在仓城内北半部的东部和中部的西半，经过较细致的钻探，探出排列整齐的、但大小和深浅都不相等的圆形窖穴二百余座。它的口径六至十八米，深度五至十米。从试掘的几座窖穴的情况看，原来的仓窖似乎是地下的或半地下的窖穴，窖顶结构不清楚。窖穴口大底小，圆壁斜下内收，窖底很坚硬，有迹象说明是经过火烧的处理。其上纵横交错铺厚木板两层，窖周壁都有朽木痕迹，表明原来围砌木板。底板和周壁木板痕的面上，还残存一层油或漆类物。看来，当时窖穴的防潮防腐措施是很周密细致的。第十九号窖穴的填土中和窖底发现刻字残砖四块，记载窖穴在仓城内的位置、储粮的来源、粮的品种、数量、入窖年月和十多个管理人的姓名和官职（图二一）<sup>④</sup>。两块铭砖上刻有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六九三年）和圣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的纪年，四块铭砖上记录了窖粮来源，有苏州、徐州和邢州、冀州等地；入窖粮食数字最多的在一万石以上。另外的窖穴中发现的铭砖记载粮食来源地，还有德州、濮州、魏州、沧州和楚州、滁州、随州等。

含嘉仓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千多年前我国大型粮仓的实例，它具

体的表明了当时储粮的特殊措施、各种记录和管理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发现揭露了隋唐统治阶级强制实行的田赋制度对全国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罪恶事实。

史书记载：“凡都之东、租纳含嘉仓”<sup>⑤</sup>；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这里储粮达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sup>⑥</sup>。大约同时的文献又说：“钱穀之司，唯务割剝”<sup>⑦</sup>，

“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sup>⑧</sup>，而老百姓“农桑之际，多缺粮种”<sup>⑨</sup>，想不到

在时隔千余年的今天，在这里竟发现了一



图二一 含嘉仓铭砖（拓本）



整窖早已霉烂了的粟米（約五十多万斤）。現在展出的两小瓶霉粟标本，就成了控訴隋唐統治階級残酷榨取劳动人民的鉄証。毛主席指出：“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繳納貢稅，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勞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鎮压农民之用的軍隊”。用以鎮压农民反抗的含嘉仓的惊人数量的窖藏，不仅証明隋唐統治階級对农民的剝削极其残酷，而且証明了他們对农民政治上的压迫也极其严重：

- ① 安阳东南濮阳北齐武平七年（公元五七六年）墓曾出青瓷器，见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刊《考古》一九六四年九期）。
- ② 安阳隋张盛墓出有大批白瓷甕，见《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刊《考古》一九五九年十期）。
- ③ 见杜宝《大业杂记》和《元河南志》卷三《隋城阙古迹》。
- ④ 这种铭砖见《旧唐书·职官志》三，“（太仓署）令掌九谷廩藏，丞为之贰。凡番罽置屋皆铭砖为度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粟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铭。”过去西安唐城中曾出贞观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这类铭砖各一块，见《金石续录》卷四。
- ⑤ 见《旧唐书·职官志》二。
- ⑥ 见《通典·食货》十二。
- ⑦ 见《通典·賦稅》下。
- ⑧ 见《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 ⑨ 见《册府元龟》卷一百〇五《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二月辛卯制》。

## 安 徽 省

### 安徽各地发现楚国金币——郢爰

文化大革命期間，安徽中部的阜南、六安、霍邱等地都发现了楚国金币——郢爰。有的是墓葬所出，有的是窖藏。

一九七〇年五月，阜南三塔公社社員在潤河南岸挖泥积肥，发现土坑墓一座。墓內放置郢爰两組，三大块郢爰和十七块馬蹄金碎块为一組，另一組是零块郢爰，包括馬蹄金两組共四十七件。大块郢爰中戳印“郢爰”小印最多的有十九印，这一发现又一次糾正了过去流行的十六印为一整块的錯誤看法①。

一九六九年春，六安陈小庄的一次发现是一处窖藏，窖藏中出有郢爰二大块、三小块。

## 肥西、合肥发现西周晚期铜器

一九七一年四月，在肥西小八里村发现一批西周晚期铜器。鼎两件，簋、小方簋、盂、匜、盘各一件。鼎直耳平盖、盖纽与两直耳形式相同（图二二），这种形制的平盖，过去只见于商周之际的方鼎中<sup>②</sup>，它应是安徽蔡器、楚器中的平盖鼎的前身。盂上部作深钵状，下部作空足鬲状，两足间的上部有短流一，形制特殊。更新颖的是附矮座的小方簋，簋身著四环，簋盖起四乳钉，可倒置过来单独为一小盛器（图二三）。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合肥市乌龟岗发现的墓葬中，出有陶罐二件，陶盂一件和西周晚期铜鼎一件。鼎附耳平盖，盖正中一匝有“乔夫人铸其俎鼎”七字铭。

两处西周晚期铜器，都有较重的地方色彩，为淮河中下游过去未发现西周晚期铜器填补了空白。

### 无为宋塔下出土的文物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无为中学宋代舍利塔下发现砖砌小墓，内置小木棺一具。绕棺列置小木雕涅槃像、磨花蓝玻璃瓶、黑漆彩绘小罐各一件和五代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篋陀罗尼经》一卷、北宋印真言二纸、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涂用和写“佛说功德陀罗尼真言”一纸、景祐三年许氏二娘一家捨资愿文一纸。墓内遗物大都完好。小涅槃像雕刻洗练，北宋玻璃瓶、漆罐也比较少见，真言两纸给北宋木板印刷增加了新标本。

① 参看《中国货币史》第一章、第二节、《楚国的爱金》

② 参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下编第一章、第一项鼎一二六、一四五两例和附图一二二、一四一。



图二二 平盖鼎



图二三 小方簋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吐魯番阿斯塔那北区晋唐墓葬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的发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繼續进行。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共发掘晋至唐墓葬一百三十余座。出土遺物有各种織染品、鞋、陶木器、俑、錢幣、銅銀飾品、麪制食品、干果和文书、书笈等。其中織染品和文书、书笈最为重要。

織染品中出現了不少以前未見和少見的新紋飾、新品种和新技法。这些新的知識，使我們对我国古代織染工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的墓葬中，发现了較多的西方紋样的平紋經錦。这些織錦中，有的还沿袭着汉錦的成行排列的花紋传统，但花紋內容却注入了当时西方习見的題材，如化生“天王”錦、牛獅象紋錦；有的更直接采用了波斯薩珊王朝喜用的联珠对禽、对兽图案，如联珠对孔雀“貴”字文錦、联珠对孔雀对獅“同”字文錦。这种外国风調的对禽对兽紋样，七世紀初在我国內地也頗为流行，称为“陵阳公样”①。以上情况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也說明了我国絲織品向西方輸出日益繁荣的盛况。

二、不少七世紀中叶的墓葬中，发现了組織疏松的联珠对禽、联珠立鳥、联珠鹿紋、联珠天馬騎士、联珠猪头等在緯綫上起花的緯錦。有人认为这种緯錦、从花紋风格到花紋織法都是波斯传统，因而推測它是波斯产品②。在中国絲織品大量輸出，并多方仿織西方花紋織品的情况下，波斯产品能否这样大批逆輸入，是值得怀疑的。对禽对兽图案的織錦，如上所述我国早已生产，如果认为組織疏松的緯綫起花的技法不似內地产品，那么“气候溫暖”、“宜蚕”③、“貢絲”④、“猷錦”⑤，并有生产毛織、棉織的历史传统⑥的吐魯番本地区，也是有生产这种緯錦的可能的。



图二四 錦 鞋

三、八世紀初的墓葬

中，发现了不少彩条纹锦，地色多样，有绿、黄，也有白、蓝。其中一件施晕绸彩，上面还以金黄色纬丝浮起四瓣小花，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晕绸锦。和彩条纹锦同出的还有黄、赭黄、绿和白色纱蜡染。一件暗绿纱饰以粉绿色狩猎纹，另一件娇黄纱饰以金黄色对鸟花束，都很活泼生动。这些提花晕绸锦和印花纱都是这时出现的新品种。

四、和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文书同墓出土的用变体宝相花纹锦缝制的云头锦鞋一双(图二四)，鞋的尖端夹缀了一条红地花鸟纹锦。同墓又发现了用同样花鸟纹锦缝制的锦袜一双。鞋、袜保存都很好。锦袜锦幅宽大，并存有幅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块斜纹纬锦(图二五)。



图二五 花鸟纹饰

它是现在所知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具有中原风格的纬锦实物。这块纬锦，在红地上用八种颜色的丝线构成图案，组织紧密，配色华丽，花鸟形态也非常生动自然，不论在组织技术上，还是在花纹的描绘技巧上，都达到很高水平，显然它已是我国织造纬锦颇为熟练时期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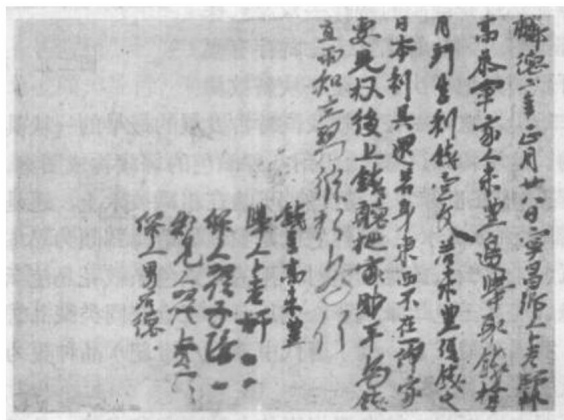
五、上述云头锦鞋的里衬，用的是六色条纹花鸟流云纹经锦，其中蓝、绿、浅红三色用晕绸彩，它比日本正仓院同类藏品⑦，在纹饰上更为绚丽。我国丝织工艺，到了唐代中期(八世纪)品种更为丰富，装饰也更为精致多彩了。

墓葬中发现的大批自晋迄唐的各种文书和书笈，是研究当时西部边境和吐鲁番一带历史的直接的文字史料：

一、官私文书。如高昌田部用水奏文(同出有高昌义和三年即公元六一六年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公元五八七年)兵部买马奏文、唐贞观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李石住上报受田不足牒和安苦啣延手实、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坊正追畦海员间事状、开耀二年(公元六八二年)宁戎驛配充驛丁名笈、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西州营名笈等。这些文书

充分暴露了当时吐鲁番一带的各族统治者残酷奴役、剝削各族人民的罪恶事实。此外还有不少私人租借契約，如高昌延昌廿九年（公元五八九年）租田契、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卜老师借錢契（图二六）、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严苟仁租葡萄园契等，这类契約中所記田租、利息之高，也反映了飽受双层重压的劳动人民的悲惨情景。

郭毡丑和汜德达墓发现的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年）三件告身，记录了唐朝和西突厥等三次重要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战役，是新发现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延載元年“授汜德达輕車都尉告身”记录了于闐、安西（龟兹）、疏勒、碎叶四鎮的重要史实⑧。



图二六 《卜老师借錢契》

上述各种文书，一部分是被剪縫作紙鞋而保存下来的，所以多有残損。在所出的紙鞋中，还发现高昌时期的残族譜和不少已佚的书笈的残片。

二、已佚的书笈。在上述已佚书笈的残片中，以隋薛道衡《典言》四个残段较为重要。薛书未见著录。有人怀疑它是北齐李若、荀士逊的《典言》，李、荀《典言》也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失传了。

《論語鄭氏注》殘卷，長五點三八米。存《為政》後半和《八佾》、《治仁》、《公冶長》三整篇。《公冶長》後附雜抄若干行，其中有景龍四年（公元七一〇年）寫書人題記：“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圖二七）。題記說明這卷《論語》是當時學童抄寫的。自漢以來《論語》、《孝經》即為我國童蒙讀物，唐代國子太學也“兼習《孝經》、《論語》”<sup>⑨</sup>，這裡當不例外；其實此地很早就已“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論語》、《孝經》了<sup>⑩</sup>。唐人讀經重南朝傳統，《論語》尚《何晏集解》，而這裡却仍承北方家學，讀鄭玄注本。《鄭玄注論語》大約散佚在宋代，清中葉一些學者曾費了很大氣力，從各種古書中搜集它的片斷。半個世紀以前，帝國主義國家的考古學者從新疆和敦煌盜竊《論語鄭氏注》殘卷五種<sup>⑪</sup>。這次發現的本子比他們竊去的為完整，在抄寫時間上也要早一個世紀以上。雜抄部分中有一行隨手抄錄的《千字文》的開頭五句。《千字文》是六世紀初周興嗣編纂的。自唐以來，它就是兒童最初誦讀的字書<sup>⑫</sup>。這行《千字文》的出現，又進一步說明了當時吐魯番一帶學童在讀《論語》之前的識字課本，也和中原完全相同。

吐魯番一帶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這批珍貴文物，更進一步說明了當時這個地區的文化面貌、風俗習慣以及封建統治階級推行的各種制度，都和中原一帶沒有大的區別，許多少數民族的人民和漢族人民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中相互融合起來了。吐魯番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據點，這裡不斷發現絲織染品及其他各種文物，使我國同西亞以及歐洲各國悠久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也越來越豐富了。

- ①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寡師輪……封陵陽公，性巧絕。草創之際，乘輿皆闕，勳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官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祥……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輪，‘至今傳之。’”
- ② 如阿克曼，見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織錦和刺繡》（刊《考古學報》一九六三年一期）
- ③ 見《周書·高昌傳》。
- ④ 見《新唐書·地理志》三。
- ⑤ 見蘇鸞《杜陽雜編》卷中。
- ⑥ 見《舊唐書·高昌傳》、《新唐書·地理志》三。



## 山 东 省

### 邹县野店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址和墓葬

野店遗址位于邹县城南十二里的野店村东南，南临龙河，面积东西约一千五百米，南北约一公里，文化层堆积厚度约一米左右。遗址是一九六五年发现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省博物馆进行了多次调查。一九七一年四月，该馆在遗址的东部偏北开方试掘，发现密集的墓葬十余座，有单人葬，也有双人葬。随葬品少的只有几件，也有多达四十九件的。第十五号墓是一座双人葬的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出土遗物多，文化类型比较清楚。骨架间出有生产工具石斧、石纺轮和装饰品玉环、石镯等。各种陶器多置于头部和脚部，特别是脚下。其中有彩陶壶、彩陶钵形鼎、红陶鼎、黑陶觚、黑陶镂空豆(图二八)、灰陶觚形器、灰陶尖足圆腹鬲等。在附近的遗址中还采集到白陶高足杯。陶器的种类和形制，说明这批墓葬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类型。这个文化类型的特点是：墓葬密集，随葬器物的数量差距大，石器磨制精细，陶器器形和纹饰复杂。这些都表明它的时间已经进入原始社会的晚期了。

### 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墓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山东省博物馆在益都苏埠屯发掘的四座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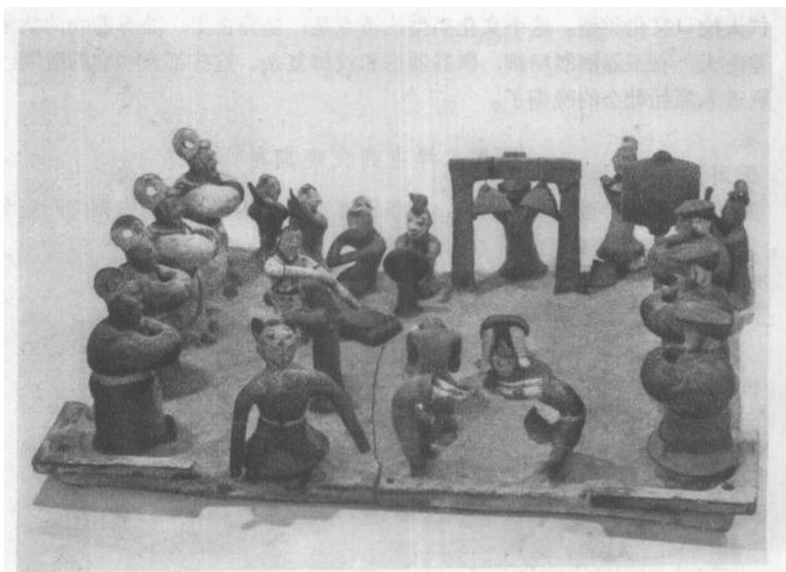
图二八 黑陶镂空豆



图二九 人面纹“亚丑”铜钺



代晚期墓葬，是研究我国奴隶社会的一批新资料。四座墓中的第一号墓，墓室面积一百六十五平方米，深八点二五米，开四条墓道，南墓道全长二六点一米，这种形制的墓，就是过去所谓亚字形墓，这种墓的最重要的现象是残酷地杀殉大量的奴隶。一号墓从腰坑下的“奠基坑”开始，自下而上，排列殉奴的数字越来越多：“奠基坑”发现一跪着的人骨架；腰坑内殉一狗，东侧的长方坑中一横队的人骨架；围槨室的二层台上发现的人骨架在七具以上；最为触目惊心的是槨室前埋人骨架三层，上层二人一狗，中层二十个人头骨和三只狗，下层殉人十二，狗一。以上共杀殉四十八人，狗六。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量杀殉，安阳以外，还是第一次发现。墓槨室早年被盗，随葬器物仅存小件铜兵器和铜车马具以及一些零星小玉饰和金箔残片，还有三千多颗贝。在北面的二层台上内沿放着两件宽约三十厘米，高约三十二厘米的铜钺，这是盗坑没有涉及的所在。两件铜钺的钺面用镂空和浮雕的技法铸出狰狞的人面形象，其中一件有“亚丑”铭文（图



图三十 乐舞杂技俑群

二九)。这个铭文的发现，使我们联想起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在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苏埠屯的大墓曾多次被盗，出土了大批铜器<sup>①</sup>，据后来统计，至少有二十件都铭有“亚丑”<sup>②</sup>，看来，四十年前的那批被盗的铜器，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号墓中物。

### 济南无影山发现西汉乐舞杂技俑群

一九六九年春，济南市博物馆在济南市北郊无影山的南坡，清理并发掘了十四座汉代土坑墓，从墓的排列、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等方面考察，知是同一时期的墓葬。其中第十四号墓出有四铢半两钱二枚，可以推测这批墓葬的时间在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铸造五铢钱之前。

第一号墓规模最大，墓坑长三点七六米，宽一点六五米。随葬陶器也最多，形制较别致的有墓坑前端放置的陶鸬、中部的陶车马和车后的乐舞杂技俑群。

陶鸬两件，都作展翼欲飞状，鸬身与两翼的上方，一置陶壶一对，一载三人两鼎，三人立于两鼎间，其一在后方持伞，另两人拱手对立立于伞下。

陶车马一组，三马驾车，两马作前导。

乐舞杂技俑群一盘，盘上置杂技四、舞伎二、奏乐人八、指挥一、拱手立作观看状者七、共二十二人（缺一奏乐人，现存二十一人）（图三十）。乐舞杂技形象屡见于东汉画像石、砖和东汉墓壁画，西汉成组的乐舞杂技形象，这是第一次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年代有可能早到公元前二世纪，过去有人认为我国杂技的兴起，由于汉武帝时西方幻戏的输入<sup>③</sup>。这组乐舞杂技俑的出现，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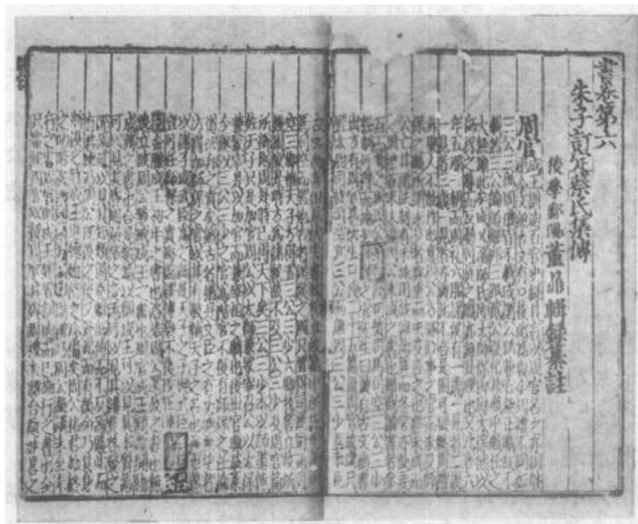
### 邹县明朱檀墓

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子，洪武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八九年）死<sup>④</sup>。墓在邹县和曲阜交界处的九龙山南麓。一九六九年冬，群众取土发现了该墓墓道。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山东省博物馆组织了发掘和清理。墓以青砖起券，分前、后室，全长二十点五米，墓底距地面深二十六米。墓内由于长年积水，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一套完整的木雕彩绘仪仗俑群共四百三十二件（各种俑四百〇六件，马二十四件，车二件），大部持有各种质料的仪仗用具，雕刻精致，敷彩鲜艳，既是一

批罕見的艺术作品，又反映了明代貴族肆虐地方，压榨人民，穷奢极欲的罪恶事实。各式各样的漆木家俱給元明之际家俱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其中巨大的盪頂描金漆箱和装玉圭的描金小匣，显示了当时漆工艺的高度水平。漆箱和漆棺中盛有各种絲棉織衣物，一件长三米，寬一米的棉織平紋被单，是現存早期棉布的重要标本，染作浅紫紅色，色調与我国現存的各种传统紅色不同。后室西南部地面上散置着很难保存下来的古琴、古画和印本书籍。琴长一二一厘米，寬一九点五厘米，高十点五厘米，七絃二柱十三徽，琴身黑漆面裂似蛇腹，后面刻琴名“天风海涛”（篆文），龙池內有写款：“圣宋隆兴甲申（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大唐雷威亲斲”两行。絹本古画三卷：宋高宗赵构題跋的金粉葵花蛱蝶和元錢选自跋的白蓮，两卷都有元世祖忽必烈姊魯国长公主的“皇姊图书”朱印和馮子振、赵巖題記；另一卷金碧山水，无款識。元刻书籍七种二十一册，除一种尚未修整不詳书名外，其目如下：

◀朱子訂定蔡氏(书)集传▶六卷三册，蝶装，元刻本。（图三一）

◀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三十卷六册，元刻本。



图三一 元刻本蝶装《书集传》

◀四书集注▶十九卷二册，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六二年）武林沈氏尚德堂刻本。

◀少微家塾点校附普通鉴节要▶六十卷二册，元至治元年（公元一三二一年）彭氏鍾秀家塾刻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五十二卷五册，元后至元七年（公元一三四一年）日新书堂刻本。

《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二册，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

以上六种，都是当时流行的书籍，不少地方都曾一再刻印，不过这里发现的版本，除韩文外⑤，似乎还未见过著录。

- ① 见祁延霏《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刊《中国考古学报》二期）。
- ② 参看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容庚《金文编》附录上。
- ③ 赵邦彦《汉画所见游戏考》（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 ④ 见《明史·诸王传》。
- ⑤ 元后至元七年日新书堂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日本内阁文库入藏一部，又残本一部，见长泽矩规也《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第二稿。

## 山 西 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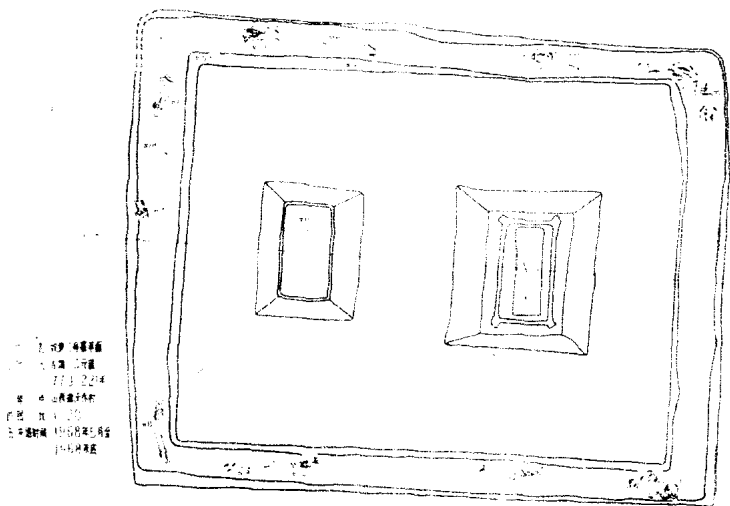
### 侯 马 战 国 墓

一九六九年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侯马乔村发掘战国中晚期墓十五座。这批墓葬的特点是：墓室四周附有埋殉奴隶的“围墓沟”；随葬品极为稀少。以第二号墓为例（图三二），有东西两墓室，东大西小，东墓室有棺有槨，人骨头部随葬小玉器二件，胸部有错金铜带钩一件，左肋外出一“釜”字小铜印，头右侧发现羊上肢骨和肋骨一堆。西墓室随葬品只一玉环，一错金铁带钩。两墓室四周宽深各约一至二米左右的“围墓沟”中，杀殉奴隶十八人，其中四人还带有刑具铁钳（铁制颈锁）。奴隶的葬式有仰、有俯、有屈、有侧，还有的作跪的姿态，埋葬的层位也不一致，有上有下，也有上下相叠的，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是使用暴力埋殉的。战国中晚期，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杀殉现象已经随着奴隶社会的瓦解而衰落，从过去的资料我们知道春秋殉人就已极为罕见，战国时期更是个别地区的残杀现象，而且一般只殉一御人，邯鄲曾发现一墓殉三人①，一九五九年这里发现的二十六、二十七号墓殉四人②，这次二号墓多达十八人，并且大部

是活埋。从骨架的姿态和带有铁钳的残酷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奴隶的激烈反抗和奴隶主使用了极端残忍的强制手段，显然，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暴行。为什么出现这样残暴事件，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不过这可以反映，在一个新制度产生之后，失败的阶级还要作垂死挣扎，各种残忍的强制手段，说明这些人在已经觉醒了的奴隶面前作最后一次的较量。历史在前进，在同一地区时代略迟的同类墓葬中人殉现象就消失了，再迟一些，就连这类墓葬本身也被淘汰了。

###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

北魏延兴四年(公元四七四年)至太和八年(公元四八四年)瑯琊郡王司马金龙夫妇墓<sup>③</sup>，于一九六五年底在大同市东十四里石家寨发现。大同博物馆进行了清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最后完成了该墓墓道的发掘工作。墓由前、后室和右耳室组成，全部砖砌，墓室全长十七点五米，墓道长二十八米，是已发现的北魏早期墓中的最大的一座。墓早年被盗，许多随葬



图三二 奴隶殉葬墓平面

品被破坏，經過修整，可編号的尚有四百五十余件。內四百〇二件是各种綠、褐釉俑（图三三），其中包括八十八件着甲騎俑的仪仗俑群，占总数約百分之八十以上。仪仗俑、乐俑的种类和姿态都和一九五三年在西安南郊草場坡北朝墓中發現的相近④。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男女俑的面相酷似大同石窟中部窟群的佛、菩薩，过去有人怀疑大同佛像摹拟拓跋人象⑤，这里发现的陶俑，似乎有助于这样的假設。馱粮馬是明器中的新題材。人面鎮墓兽、駱駝和一具鉄馬蹬，都是前此所未見。后室石棺床和屏风础石的雕刻內容，都見于大同石窟，但較石窟更生动、細致。彩画的漆屏风早已朽散了，但从保存較好的几块残段中，知道彩画的內容，大部分是列女故事（图三四）⑥。故事中的人物劲綫淡彩，儼然顾愷之《女史箴》、《洛神賦》笔意。故事画上的榜題和說明，字体秀健適丽，是晋隶向真书过渡的典型。司馬金龙墓所出文物，从塑造、雕刻到繪画、书法都丰富了北魏的造型艺术，是我国美术史上的一次較重要的发现。

司馬金龙是东晋貴族，由于东晋权貴內闕，金龙父楚之投降北魏，据文献記載楚之父在北魏世居要职。“民族斗争，說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即使在民族关系比較复杂的南北朝也不例外，此墓所反映的各种情况，給我們提供了实物例証。



图三三 釉陶俑

### 大同南郊北魏遗址

一九七〇年，大同博物館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側，清理了两处北魏遗址。两处遗址相距不到二十米，附近出有大型方础、筒瓦和石臼等，可以推測，这里是一座具有一定規模的建築遗址。此处遗址的位置，对測定、勘察北魏早期都城平城的方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东遗址出有石雕方硯一件（图三五），硯面浮雕出的耳杯形水池、硯側的云龙、朱雀、水禽銜魚等文飾和下部壺門还保存着方形式样等，都說明它比司馬金龙墓的石雕略早。西遗址发现曲沿銀洗一件、鑲嵌或高雕的鑲金高足銅杯三件（图三六）和綫雕銀甌一件。这批金屬器

物的造型和植物花紋、人物裝飾等，都具有浓厚的西亚风味，显然，这是北魏迁洛以前輸入的西方工艺品。文献記載，五世紀中叶，北魏和西方往来即已越葱岭，极西海<sup>⑦</sup>；五世紀八十年代前后平城地区就集居了不少中亚、西亚的僧人、艺术家和“貨財百万”的商人<sup>⑧</sup>，这几件外国器物的出土，給这些中外交往的史实，增加了新的实物資料。

- ① 程明远《邯郸发现一座带殉葬人的战国墓》（刊《文物》一九六〇年二期）。
- ② 《侯马东周殉人墓》（刊《文物》一九六〇年八、九合期）。
- ③ 司马金龙，《魏书》有传，附《司马楚之传》后。
- ④ 见《西安南郊草場坡北朝墓的发掘》（刊《考古》一九五九年六期）。
- ⑤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六章、第三节。
- ⑥ 屏凤自汉以来多图画烈女，参看《太平御览》卷七百〇一屏风条引《东观汉记》、刘向《七略别传》等记载。
- ⑦ 见《魏书·西域传》。
- ⑧ 参看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佛陀禅师传》。



图三四 木板漆画



图三五 石碗



图三六 鎏金高足铜杯

## 甘 肃 省

### 武威东汉墓

一九六九年底，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城北二里的雷台下，清理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墓分前、中、后三室，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自墓门至后室总长一九点三四米。出土遗物共二百三十件。大部分是铜器，也出有陶器、漆器和金银器。此外还出有铜钱二万余枚，其中“剪边五铢”约占半数，也有少量的“缿环五铢”和“四出五铢”。这三种五铢钱，都是东汉晚期流行的貨幣。

铜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鑄造精致的武装車馬出行行列，包括俑四十五个，車十四輛，牛一头，馬三十九匹。俑有持戟、矛、鉞等兵器的騎俑，有男女立俑。立俑背有刻銘“张氏婢”者四人，“张氏奴”者八人。馬有駕車馬，其中胸有刻銘的五匹，銘文是：“守左騎千人张掖长张君小車馬御奴一人”、“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輦車馬将車奴一人从婢一人”、“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輦車馬将車奴一人从婢二人”、“冀张君小車馬御奴一人”、“冀张君夫人輦車馬将車奴一人从婢一人”。有騎馬，其中三匹胸有刻銘：“守左騎千人张掖长张君騎馬一匹牵馬奴一人”、“守张掖长张君郎君阿邠騎馬一匹牵馬奴一人”、“冀张君騎一匹牵馬奴一人”。另有五匹騎馬自为一組，其中一匹軀体高大，大約是主騎。这些銅馬駿健生动，各具不同姿态，反映了当时雕鑄艺术的成就。工艺水平最高的是一匹奔馬。馬高三四厘米，长四五厘米，昂首揚尾，三足騰空，雕鑄工师別具匠心地把支撑馬身全部重量的右后足，放在一只飞鳥身上，既表达了奔馬“矢激电馳”的速度超过飞鳥，又巧妙地利用飞鳥的軀体，扩大了着地点的面积，保证了奔馬的稳定。

銅器之外，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大的釉陶樓院。周繞围墙，前面正中建門樓（上层失），围墙上下四隅建角樓，各角樓間建有栏杆的天桥，这大約即文献所記“以版跳出櫓”<sup>①</sup>的櫓。围墙內左右后三面又設复牆，复牆內立高樓五层。这是东汉晚期一处典型的樓櫓塢壁建築模型。

武装的車馬出行行列、陶制樓櫓塢壁和銅馬胸前的刻銘，还有墓中發現的龟紐銀质“□□將軍章”，充分說明了这是一座拥有武装的豪强大官



僚的墓葬。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经济急剧发展，“百夫之豪，州以千計”<sup>②</sup>，像此墓这样的豪强大官僚更“連栋数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計”<sup>③</sup>，他們拥有大量武装，割据一方。全国各地东汉地主階級的墓葬中较为普遍地發現陶制樓櫓塼壁和車馬出行行列塼壁画等，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尖銳的階級对立<sup>④</sup>，武威东汉墓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为东汉晚期階級关系記載較少的河西地区，提供了階級斗争的重要資料。

① 参看《通典·兵》五。

② 见《文选》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昌言》。

③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④ 参看《楼櫓塼壁与东汉的阶级斗争》（刊《考古》一九六二年四期）。

## 北 京 市

### 北京外城东周晚期陶井群

解放以后，北京外城西部零星发现了不少由陶井圈組成的陶井，它的时代和用途一直没有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工程的进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宣武門外东西一綫、广安門内外、法源寺东北清理了大批陶井，因为配合工程的紧急，沒有进一步追踪与陶井有关的各种遗迹，但对陶井的分期和各期陶井大体上的分布情况作了初步探討，給首都历史的研究增加了新資料。

陶井的結構是先挖一直径大于井圈的土井，然后将井圈在土井中套叠起来砌成筒状，土井与井圈外壁之間用土或碎陶片填塞。当土井下及流沙层，挖除流沙效果不大时，即放下井圈，在井圈内部挖沙，使井圈逐步下降，以达水层，这种做法是古代劳动人民在不断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的創造之一。近代修建桥墩使用的沉井，就是根据这个造井原理来的，举世瞩目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主要桥墩，也是利用了沉井方法建成的，当然这是我国工人階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沉井基础上更加进步的新創造。

对陶井的叠压关系和各种遗迹、遗物的分析，可以推知大約在战国中期的陶井使用的井圈径小圈高，西汉初则径大圈低；和这同时又出現一种用三块三分之一圓的陶壁板拼合成的陶井圈，使用这种新式陶井圈，并

径更增大了。再后，井圈組成的陶井就让位給砖井。这个地区也发现了东汉迄辽金时代的砖井。

发现陶井的主要区域，适在唐幽州、辽南京的范围内，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段，也是战国陶井分布最多的所在，在今宣武門外以西迄白云观迤西一綫。这里又正处在推测是薊丘的附近，薊丘是战国以来燕都薊城中的一个著名高地。这样就給唐幽州沿战国、西汉薊城旧址的說法，增加了有力証据，因而使首都地区最早形成的大集居点的方位，也越来越明确了。

## 元大都遗迹

元大都的考古工作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前，但一些主要的发掘工作却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共同进行的。

从对元大都的外郭城、皇城、宫城、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的勘测中，使我們对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和形制有了一个比較清楚的了解。这个城市的中軸綫，是从南城的丽正門开始，穿过皇城、宫城，經万宁桥（即海子桥，今地安門桥）而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閣（今钟楼）。在景山公园少年宮前发现的建筑遗迹可能是宫城的北門址，景山北牆后发现的寬达二十八米的南北向大路，是这条中軸大路的一段。它的街道分布，正象当时旅居在大都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全城划地为方形”，“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①。更确切地說，它的主要形式是在南北主干大街的东西兩側平列着許多等距离的横胡同，今天北京內城的許多天街、胡同，就是沿袭了元大都的旧迹。专供宮廷用水的金水河故道和海子的范围、金口河故道等遗迹也都发现了。一九七〇年发掘了两座地下的排水渠道，有“致和元年（公元一三二八年）五月日石匠刘三”刻銘的主干大街旁的石筑泄水渠，还很完整地保留在地下。

埋在明建城牆下面的居住遗址，是了解元大都各阶級的生活的重要資料。雍和宮豁口的居住遗址是一处院落。院落中用砖砌出十字形高露道；前附月台的三間北房，方砖鋪地，当心間为正厅，兩次間三面都用砖坯围砌成炕；东西廂各三間；南房超出城基之外已早被拆毀。

后英房居住址也是一处院落。它的南北房之間用三間穿廊相連，这种工字形平面的建筑，是宋元时期大型建筑物流行的形式之一。北、南、西房建筑质量相当好，室內也围砌土坯炕，炕沿以下用木板裝飾。从发掘情

况看，这个住宅的主人在明初筑城拆毁房屋时，匆忙地离去。甚至没有来得及全部搬走他的生活用具。数量很多的生活用具和被拆卸的门窗，与房基一块被夯埋在城墙下面。在这里发现一件残破的径约三十七厘米的螺钿漆盘，它用閃爍着五光十色的海螺壳在盘心嵌成一幅有广寒宫作背景的嫦娥奔月图，这样精工細雕、自然設色效果很高的軟螺钿漆器，过去只知道有明中叶以后的作品，这次发现，把这种高技艺的漆工艺的創造，提早了一个世紀以上。

这两处居住遗址都是属于封建統治階級的，它的建筑和生活用具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劳而获的剝削生活。創造元大都全部物质、精神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則是生活在如一〇六中学內发现的一間低窄的住房里，那里的墙壁用碎砖壘砌，房內仅有一炕一灶和一个舂米用的石臼。这个貧穷的劳动人民的住房，与上述两处高爽的院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正是元大都階級对立的縮影。

一九七〇年十月，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东的居住遗址里，发现了十六件窖藏起来的元代瓷器：九件青花瓷器，有盘、碗、扁壺(图三七)、带托小盞(图三八)等，胎釉和造形等技法已相当成熟，給研究元代青花瓷器提供了一批更确实的材料；七件影青瓷器，有碗、高足碗、高足盞和匜等，



图三七 青花扁壺



图三八 青花带托小盞

其中两件青瓷碗底部墨书一个八思巴字，该字读音作“张”或“章”，可以推测这批瓷器是一个姓“张”或“章”的窖藏。

一九六九年以前，在桦皮厂附近的明代城墙的拆除工程中，发现了不少石刻，其中较重要的有妣儿年（延祐四年即公元一三一六年）福寿兴元观圣旨白话碑，碑身高三点二六米，完整无缺。另有锦地灵芝双兽、双凤麒麟大型石雕两块，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此外，还发现了辽重熙廿二年（公元一〇五三年）张俭墓志<sup>②</sup>，它是明初筑城时被用作基石砌入的。

很多元大都的遗迹、遗物，都被埋入明初修建的城基之内而保存下来，和义门瓮城城门，就被包砌在明西直门瓮城箭楼下面。它建于元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年）<sup>③</sup>，这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全国，一支农民军从济南直逼大都近郊，和义门瓮城的修建是元代统治者为了抗拒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措施之一。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毛主席又指出：“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当时大都发生了连续两年的严重饥荒，文献记载当时掩埋的骸骨就有二十余万具之多<sup>④</sup>，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代统治者还迫使广大劳动人民修筑瓮城！一九六九年发掘出来的和义门瓮城城门从石路面至城墙上残存的墙壁，全高约十二米，城门洞长十点三二米，宽四点五四米，外洞高四点五六米，内洞高六点八米，城楼上有第一次见到防御火攻城门时的灭火设备，很清楚，元代统治者当时是力图使瓮城坚固难攻的，但在农民起义的强大攻势下，经济力量已近枯竭，这座城门的建筑不仅用料粗恶，施工也极为草率，这么大的城门，竟连地基都没有来得及做，就仓促施工了。这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瓮城建成后还不到十年，元朝统治者终于在强大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遭到了彻底复灭的下场。

① 见冯承钧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记》卷二、第八十四章、注七。

② 张俭，《辽史》卷八十有传。

③ 见《元史·顺帝纪》九。

④ 见《元史·顺帝完者忽都皇后传》、《朴不花传》。

# 中国历史年表

原始社会	約 50 万年—4000 多年前
奴隶社会	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 前 475 年
夏	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 前16世紀
商	約公元前16世紀—公元 前11世紀
西周	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 前 770 年
春秋	公 元 前 770 年—公 元 前 475 年
封建社会	公 元 前 475 年—公 元 前 1840 年
战国	公 元 前 475 年—公 元 前 221 年
秦	公 元 前 221 年—公 元 前 207 年
西汉	公 元 前 206 年—公 元 24 年
东汉	公 元 25 年—公 元 220 年
三国	公 元 220 年—公 元 265 年
魏	公 元 220 年—公 元 265 年
蜀	公 元 221 年—公 元 263 年
吳	公 元 221 年—公 元 280 年
西晋	公 元 265 年—公 元 316 年
东晋	公 元 317 年—公 元 420 年
南北朝	公 元 420 年—公 元 589 年
南朝	公 元 420 年—公 元 589 年
宋	公 元 420 年—公 元 479 年
齐	公 元 479 年—公 元 502 年
梁	公 元 502 年—公 元 557 年
陈	公 元 557 年—公 元 589 年
北朝	公 元 386 年—公 元 581 年
北魏	公 元 386 年—公 元 534 年
东魏	公 元 534 年—公 元 550 年
西魏	公 元 535 年—公 元 557 年
北齐	公 元 550 年—公 元 577 年
北周	公 元 557 年—公 元 581 年
隋	公 元 581 年—公 元 618 年
唐	公 元 618 年—公 元 907 年
五代十国	公 元 907 年—公 元 979 年
宋	公 元 960 年—公 元 1279 年
辽	公 元 916 年—公 元 1125 年
西夏	公 元 1038 年—公 元 1227 年
金	公 元 1115 年—公 元 1234 年
元	公 元 1271 年—公 元 1368 年
明	公 元 1368 年—公 元 1644 年
清	公 元 1644 年—公 元 1840 年(道光20年)



长 信 官 灯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竇綰墓中出土。灯盘下刻有“长信”等铭文。遍体鎏金。灯光的照射幅度和方向可以任意调节，具有高度的工艺制造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  
出土文物

\*

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輯、出版  
人民美術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